



简报

性少数性工作者经历的恐同与恐跨性别

性少数性工作者经历的恐同与恐跨性别

介绍

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 (LGBT) 人群经历着包括法律、政治和社会各个层面针对他们的恐同和恐跨性别。对于作为性少数的性工作者，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身份的歧视，同时受到性工作者本身带来的歧视，会遭到一系列特殊侵犯。性少数性工作者的双重身份有可能导致进一步边缘化，使他们更容易受到更多更严重的暴力、人权侵害，更难获得服务和公正。

性少数性工作者的双重身份有可能导致进一步边缘化，使他们更容易受到更多更严重的暴力、人权侵害，更难获得服务和公正。

简报记录了性少数性工作者经历的污名和歧视，强调了不同社群的不同经验。为应对身处性工作与性少数重叠区域而经历的双重污名和歧视所提出的建议。

本简报是由MPact全球男同性恋健康与权利行动 (前MSMGF) 和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NSWP)。

背景

世界各地的性少数者仍在经历惩罚性法律政策和措施，包括刑事定罪、污名、歧视和社会排斥。2017年国际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间性人协会 (ILGA) 的调查显示，72个国家仍在对同性性行为刑事定罪，13个国家可能适用死刑。这些包括由沙利亚法管制的国家。尽管有124个国家对成人同性性行为没有法律惩罚¹，其中很多国家没有保护性法律来确保性少数者不受直接歧视或暴力。

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性少数者都反映经历了某种形式的污名和歧视。这包括导致难以获取住房、教育、医疗和工作的制度性障碍，以及造成人权侵犯或人权不能实现。近年来，我们观察到保守主义抬头，国家支持的恐同/恐跨性别，公民社会自由表达和空间受限。这体现了严重的法制倒退，性少数权利后退，在车臣、印度尼西亚、埃及、俄罗斯和坦桑尼亚等地暴力事件增加。²

大多数国家对性工作或性工作相关活动采取不同程度的刑事定罪。³ 即使没有对性工作有专门法律的国家，也会使用其他法律、政策和措施来打压性工作者。刑事定罪对性工作者人权和健康有灾难性影响，限制他们获取各类服务的途径。因此，性工作者受暴力⁴ 和艾滋病毒⁵ 影响过高。

刑事定罪是使性工作者生活更危险的法律制度，加剧了针对他们的歧视，撤销了获取法律保护的途径，制造了对性工作者施加暴力可不受惩罚的氛围。其他损害性法律制度还包括“终止需求”法制⁶ (如北欧模式)，就是对买性者刑事定罪。在这种框架下，性工作者更容易遭受暴力、歧视和剥削，面临来自当局的骚扰、起诉和任意逮捕。“合法化”框架经常对性工作加诸不必要的限制，将性工作者分为合法和非法两种，导致“非法”性工作者处于剥削性工作环境和遇到人权侵犯。

1 Aengus Carroll等,《国家支持的恐同》, ILGA (2017): 8-9

2 Graeme Reid,《性少数权利, 苦捱一年看前路》, 人权观察HRW (2018)

3 UNAIDS, 2018,《关键人群图集》

4 Kathleen Deering等,《对针对性工作者暴力的相关性的系统审查》, 美国公共卫生期刊, (2014): 1

5 柳叶刀, 2014,《性工作者相关事实与助长艾滋病毒蔓延的迷思》

6 NSWP, 2014,《性工作与法律: 理解法律框架和为性工作法律改革奋斗》

性少数性工作者因性少数和性工作身份而受到歧视和刑事定罪。性少数性工作者中感染艾滋病毒的⁷、移民或少数民族⁸可能被进一步边缘化。

性少数性工作者因性少数和性工作身份而受到歧视和刑事定罪。性少数性工作者中感染艾滋病毒的、移民或少数民族可能被进一步边缘化。

对性工作者的性取向和性别身份的研究不多。没有这类书籍，很难量化并为这些处于污名与歧视交叉风险的人群提供相应干预服务。性少数性工作者长期处于性少数平权运动的前线，并将继续如此，但这没有被广泛的性少数社群或性工作社群认识到。本简报将提升人们对性少数性工作者的特殊需求与困难的意识。

研究方法

本政策简报是基于国家顾问在10个国家开展的深度研究，包括焦点小组讨论和对性少数性工作者的标准化问卷访谈。使用相同问卷对NSWP和MPact成员组织进行在线全球调研，以补充国家深度研究。问卷有多语言版本。另外，深度访谈一般由几个国家的成员机构推荐的关键信息人进行。国家深度研究在澳大利亚、奥地利、博茨瓦纳、喀麦隆、印度尼西亚、牙买加、巴基斯坦、秘鲁、乌克兰和美国进行，一共有87名女性、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参与了焦点小组和深度访谈，里面有身份证件和没有身份证件的移徙性工作者、感染艾滋病毒的性工作者、有城里和农村的。大多数受访者在18-50岁之间，有一些性工作者超过50岁。他们工作的地方包括：街头和公共场所；自家、酒店或客户居所；妓院/沙龙/酒吧/桑拿等有人管理的场所。有12个成员组织回复了在线咨询。

注：一些参与者并非以准备好作为性少数性工作者发言，他们更愿意用性工作者或性少数的身份。一般，施加于女性和双性工作者的侵犯并不专门朝向双重身份，而男性或跨性别性工作者则更多反映针对双重身份的侵犯。

对性工作和性少数社群的刑事定罪：双重歧视的影响

证据显示对性工作的去罪化可带来更安全的工作环境和降低污名与歧视。⁹ 去罪化让性工作者可以在支持性环境中工作，在遇到骚扰或暴力时采取法律手段¹⁰，公开获取医疗服务而不受批判。这让他们可以形成网络，组织团体并运用权力争取更好的环境条件。

相反，对性工作者客人刑事定罪对性工作者的安全有长远的负面影响，迫使他们简单筛选客人，在更为危险的地区工作，或被迫接受无保护性行为。¹¹ 艾滋病毒预防工作被刑事定罪所损害。在全球，很多国家将持有安全套在起诉中作为性工作证据¹²，激进的管治使与客户协商安全套使用变得更加困难。在2014年《柳叶刀》发表的研究推断，如果性工作被去罪化，在下一个十年可以避免33-46%的艾滋病毒感染。¹³

同性恋在72个国家被刑事定罪，惩罚可能是有期徒刑到死刑。一些国家禁止对性少数社群或身份进行倡导活动。像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一些地方允许用“同性恋恐慌”来辩护，即犯罪者可以用对“不受欢迎的同性恋表示”的恐惧作为针对同性恋罪行减刑的理由。美国一些州也允许类似“跨性别恐慌”的辩护。“矫正”强奸和强迫婚姻也常见于对女同性恋的行动。对跨性别者还有更多人权践踏，很多国家不承认改变性别身份，剥夺跨性别者平等权利，对性别不明确的行为刑事定罪。¹⁴

7 UNAIDS, UNDP, UNHCR, UNICEF, WFP, UNFPA, UNODC, ILO, UNESCO, WHO, World Bank, 2008,《政策简报：对艾滋病毒传播的刑事定罪》，1-2

8 NSWP, 2018,《简报：移徙性工作者》

9 Jules, Kim等,《对性工作去罪化：证据就在其中》，澳大利亚艾滋病组织联合会(2015)

10 新西兰人权审判庭, 2014, DML诉蒙哥马利(2014年2月12日)

11 A Krüs等,《对客人刑事定罪：制造加拿大街头性工作者对暴力的脆弱性和健康不良——质性研究》，BMJ Open (2014)

12 Roger Collier,《安全套之于性工作：保护还是证据?》，CMAJ (2014)

13 Kate Shannon等,《全球女性性工作者中的艾滋病毒蔓延：系统性损害的影响》，柳叶刀, 385卷, 9962期, P55

14 ILGA, 2017,《合法跨性别图绘报告》

对同性关系和性别身份的刑事定罪通常是基于落后的道德宗教信仰。法律改革也只是第一步。无论法律如何，恐同和恐跨性别都根深蒂固，无论法律是去罪化还是自由化。改变人内心想法需要好几代；即使法律变了，人内心的信念和偏见也不会立刻跟着变。

“对性少数社群的歧视和不满，以及相关的社会污名，多来自宗教和父权观念，让性少数者难以拥有稳定的关系。性少数社群仍能社交、组织、约会甚至像伴侣一样生活，但通常是秘密地……性少数社群成员经常因为性取向和行为面临歧视。根据伊斯兰法，社会不接纳以及错误认为他们必须被惩罚。他们没有权利公开生活和工作，因为社会认为他们对孩子有坏影响，所有的性少数活动都不符合意思啦信仰。”

性少数性工作者，巴基斯坦

当前巴基斯坦刑法（第377条）¹⁵ 涉及“不自然犯罪”，适用于对性工作判处最高10年监禁。在该国一些地区使用沙利亚法（联邦直辖部落地区（FATA）），性工作通常被判死刑。巴基斯坦性少数者没有公民权。女同性恋性活动尤其有严重后果，在社会中隐藏很深。由于在ISIS控制地区一旦发现有严重后果，巴基斯坦女同性恋性工作者保持隐形，以避免被处死或“矫正”性强奸或结婚。

“同性恋在巴基斯坦存在，但通常隐藏起来。同性恋女性不会承认自己的双性恋或同性恋。因为严厉的法律和禁忌，巴基斯坦一切女性同性恋活动都是最高机密。”

性少数性工作者，巴基斯坦

性少数者若要从性工作，会增加监禁、死刑、疾病、强奸和其他创伤性事件的威胁和风险。双重身份所致双重刑事定罪带来更多的边缘化。

“我最近发现，在澳大利亚性工作这个职业可以在法庭审强奸案时用来攻击你。辩护人可以说，由于是性工作者，所以强奸犯应该判更短刑期，因为这对性工作者伤害会小一些。”

性少数性工作者，澳大利亚

对LGBT性工作者的执法

世界多地的执法人员紧盯性少数性工作者，提出指控，使他们遇到监禁和警方强暴的风险更高。¹⁶ 对性工作者和性少数的双重刑事定罪在健康方面设置了诸多障碍。

对性工作的刑事定罪是这些警方目标难以获得公正，其中性少数者尤其是这样。例如，在乌克兰，双性恋女性性工作者反映警方逮捕和强奸他们的情况很平常。其他性少数性工作者反映遭到警方逮捕、勒索金钱，因为被暴打而无法工作。

世界多地的执法人员紧盯性少数性工作者，提出指控，使他们遇到监禁和警方强暴的风险更高。

“有一次我站在提供服务的地方。警方过来，开始威胁我，羞辱我，拿走了所有我挣的钱，占我的便宜。这都不止一次。他经常来，强奸我，拿走钱。如果我拒绝，他就狠狠打我。一段时间后，我没法工作了，因为我靠外表吃饭。因此，只能藏好钱，不向任何人抱怨，保持沉默。我不觉得向警方报案有用。如果警方发现我做的事，他们就会留个我卖淫的记录。警察还会栽赃毒品。”

双性恋女性性工作者，乌克兰

15 OECD, (1860), 《巴基斯坦刑法》

16 Harper J. Tobin等,《平等蓝图：跨性别者的联合议程》，跨性别平等国家中心 (2015): 27-30

性取向、性别身份和性工作在牙买加都被刑事定罪，尽管警方不会主动去盯上性工作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和他们客户）仍害怕歧视。

“警察不会把性工作者锁起来。尽管觉得政策和法律需要做出改变，让卖淫合法，让人们能公开谈跨性别身份，不担心歧视。一些客人直接想找跨性别女性。”

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牙买加

性少数性工作者，尤其是跨性别和移徙性工作者，通常不向警方报案：

“我不知道谁会保护一个跨性别性工作者……在工作时，客人经常口头攻击我。如果我报警，就得说‘您好我是个妓女，一个客人骚扰我’（哈哈）。他们就会到我这里，看有什么问题，然后把我关进监狱。因为我是个性工作者。他们不在乎我。”

跨性别女性移徙性工作者，奥地利

2018年，美国通过新的法律，打击知名“推广卖淫”的在线平台。该法律即SESTA/FOSTA¹⁷，该法律混淆了人口贩运与性工作，有效导致了性工作广告从美国平台上消失。性工作者之前用这些平台过滤客人，分享信息和自我保护。性工作者，尤其是跨性别有色人种女性¹⁸，自那时起就被迫进入街头工作，面临更多逮捕风险与暴力。

医疗可及性

对性取向、性别身份和性工作刑事定罪在心理健康机构等医疗机构中造成了污名。¹⁹ 性少数性工作者难以获得服务，害怕被举报到当局或被强制检测治疗。另外，刑事定罪也导致恐同和恐跨性别内化，与性工作和性少数社群隔离，拒绝面向这些社群的服务和项目。²⁰

性少数性工作者面临医疗人员²¹的歧视、羞辱和拒绝服务。这可能是针对他们的性取向、性别身份或他们的性工作，或这些的混合。这进一步限制了他们获取重要医疗服务的能力，包括艾滋病毒预防治疗服务，性与生殖健康服务和变性健康服务，让他们面临更多危险。如果性少数性工作者不认为可以与医疗专业人员开放对话，就会导致误诊和不当治疗。

例如在博茨瓦纳，政府都试图用法律政策实施一些非歧视性的途径，公立医疗机构中仍以很多微妙方式体现了歧视：

“当告诉护士我有肛交经历后，她打开一本圣经开始祈祷和驱魔。我感到很羞耻。”

男同性恋性工作者，博茨瓦纳

另一个受访者讲述了负面经历是如何让他们难以获得医疗服务，无法在安全环境开展工作，要担心自己感染艾滋病性病。

性少数性工作者面临医疗人员的歧视、羞辱和拒绝服务。这可能是针对他们的性取向、性别身份或他们的性工作，或这些的混合。

17 NSWP, 2018, 《美国FOSTA/SESTA法律》

18 《无网络相隔，跨性别性工作者更加不安》，WNYC

19 Nitasha Puri等,《城市性工作者精神诊断的负担与相关》, BMC Women's Health (2017): 2-3.

20 Tonia Poteat等,《8个非洲国家中跨性别女性和有男男性行为的顺性男性中的艾滋病毒感染及行为心理因素：交叉区域分析》, PLOS Medicine (2017): 8-9.

21 Fiona Scorgie等,《我们在医院中受到憎恨：四个非洲国家中性工作者获取医疗服务的经历》, Semantics Scholar (2013): 2-6

专家谴责对艾滋病毒传播刑事定罪，不仅因为这是无用的司法和公共卫生对策，还因为“专门对艾滋病毒不披露、暴露或传播进行刑事定罪的法律……加剧了艾滋病毒相关污名，减少人们获取艾滋病毒服务的意愿”。²² 这会导致对特定群体的不公正打击，包括性工作者。在澳大利亚，一名女性跨性别前性工作者被判监禁（在男子监狱），她被认为向前伴侣传播了艾滋病毒。²³ 对该案件的担忧一是其中使用的证据，更重要的是媒体对庭审的报道加剧了对性工作者的恐惧和污名，伤害了艾滋病毒预防策略。

“在CJ Palmer的案件中，她不知道自己感染了，大多数传播都是不知道自己感染的人做的。”

性少数性工作者，澳大利亚

一篇近期的柳叶刀文章²⁴ 强调了性工作者过高的艾滋病毒感染率，最高是跨性别性工作者。文章强调了需要更多艾滋病毒传播率的数据，抗病毒治疗应当覆盖所有性工作者，尤其是跨性别人群，他们被剥夺得最严重。

“关于艾滋病毒传播和抗病毒治疗 (ART) 覆盖的全面数据极少，尤其是跨性别女性的数据……尽管生物医药干预有了重要进展，如暴露前预防和早期抗病毒治疗的可行性和示范项目，限制范围保留意味着需要对社群可持续投入和系统性干预，使性工作者和其他人群一样能够从预防干预和治疗中获益。”

对暴力的脆弱性

暴力是性少数性工作者特有的社会和公共卫生问题。暴力影响了他们健康的各个方面，使其不能完全享有法律权利和人权。暴力与艾滋病毒之间关系明确，暴力增加了对艾滋病毒的脆弱性，因为它限制了协商安全性行为的能力，降低了医疗和其他重要服务的可及性，让人担心报复、歧视和拒绝服务。暴力来自不同方面。

…暴力增加了对艾滋病毒的脆弱性，因为它限制了协商安全性行为的能力，降低了医疗和其他重要服务的可及性，让人担心报复、歧视和拒绝服务。

在博茨瓦纳，性工作者参加焦点小组的性工作者强调他们很容易因为性取向而遭到虐待。这在跨性别和男同性恋性工作者中更明显，因为客人辱骂他们“想骗人”；他们面临更严重的语言、身体、经济和性虐待。一些人反映他们不想向警方报案，因为可能导致他们“出柜”。所有受访者都反映曾在近期受过语言辱骂，三分之一的人遭受过身体和性虐待，半数以上受到经济暴力。

印度尼西亚性少数性工作者反映主导性的异性恋叙事在男性性工作者中建立了对暴力“沉默蔓延”：

“主流媒体说我们不正常。有时我想这是真的，我不正常。我从未将任何男性性工作者作为暴力受害者看待。”

性少数性工作者，印度尼西亚

一些受访者反映，对性少数的刻板印象包括“善淫”，这导致客人对服务的期望更高，使他们更容易遭受暴力：

“对性少数社群的淫乱印象让客人期望更高，影响客人和性工作者之间的互动。”

性少数性工作者，澳大利亚

22 UNAIDS, 2018,《专家领袖呼吁刑法系统确保在涉及艾滋病毒的刑事案件中基于科学信息应用法律》

23 NSW, 2018,《性工作者组织提升对艾滋病毒刑事定罪案件的关注》

24 Kate Shannon等,《全球关于艾滋病毒与性工作者的工作与不足的行动》,柳叶刀: 392(2018): 698-710

女同性恋性工作者反映，如果客人怀疑你不是异性恋，就很容易遭到暴力：

“我无数次遭到客人暴力，我知道担心被出柜会激发暴力，尤其是客人可能感觉受骗，质问我是不是异性恋。这迫使女同性恋性工作者为自身安全创造和维护双重性取向身份。”

女同性恋性工作者，美国

不同人有不同动机对性少数性工作者施加暴力，包括一般公众。施害者包括邻居和社区，他们认为性工作者“扰乱”了他们的街区；原教旨女权主义者视所有的性工作都是针对女性的暴力，性剥削或“非女权”的。

“女同性恋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在加拿大，他们经常暴力攻击性少数性工作者。”

性少数性工作者，加拿大

除了来自社会的骚扰和敌意，一些性少数性工作者还反映了其他性工作者和性少数社群施加的暴力：

“歧视、憎恨和指责更多朝向男同性恋和跨性别性工作者，这种打击来自其他不认为自己是性少数的性工作者，他们说男同性恋和跨性别女性‘抢了’他们客人……不是说同性恋女性和双性恋性工作者就不会遇到虐待，他们面对更大的性少数社群的攻击，因为有人认为是这些从事性工作者的人导致性少数摆脱不了刻板印象。”

性少数性工作者，博茨瓦纳

在牙买加访谈的男性同性恋和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讲述了被警察喷胡椒和骚扰，客人抢劫和不给钱：

“披露一个人跨性别身份的危险要和个人生活一起考虑，对从事性工作的跨性别女性而言受伤害的可能性更高。”

性少数性工作者，牙买加

因此，一些牙买加性少数性工作者发明策略来维护安全，避免对性少数有敌意的地方，以及近期发生暴力事件的地方。

全球跨性别性工作者仍面临严重的暴力和排斥。跨性别者受到广泛的社会污名，经常被家庭拒绝，遭遇极端偏见和因主流就业市场排斥而导致的贫穷。跨性别性工作者的生活和工作都处于恐妓和恐跨性别的双重重合处。²⁵ 对很多跨性别者而言，性工作是应对排斥的一种灵活策略。传统顺性女性和男性占据了室内性工作场所，如按摩沙龙，妓院和桑拿。跨性别性工作者多选择室外工作，让他们更容易被暴力侵害，如憎恨犯罪、强奸和死刑。从2008年1月到2017年9月，全球有2609个已知的针对跨性别和多元性别的谋杀。数据分析显示所有针对跨性别和性别多元的谋杀中有62%的受害者已知是性工作者。²⁶

“我觉得作为性工作者我赚的少是因为我是男人。很多客人对我‘更恶劣’因为他们认为我‘娘’想对我做那些他们不会对顺性男人做的（包括性攻击）。我的反应要么是安静退缩，要么是暴力反击。”

跨性别男性性工作者，美国

从2008年1月到2017年9月，全球有2609个已知的针对跨性别和多元性别的谋杀。

25 NSWSP, 2014, 《跨性别性工作者的需求与权利》

26 TGEU, 2009, 《跨性别者谋杀监测 (TMM) 资源》

“一个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被客户强迫使用毒品，这在她答应和他去酒店前并没说。在她毒品发作无力时，他叫朋友来，轮流和她发生关系还不用安全套。她醒来后，所有人都离开了酒店，还带走她的钱包和手机。”

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越南

跨性别男性性工作者更为脆弱，他们在研究和讨论中经常是隐形的。2015年美国国家报告《有意义工作：跨性别者在性工作的遭遇》²⁷表示：

“跨性别女性受访者进入性行业的时跨性别男性受访者的两倍（13.1% vs. 7.1%）。然而，跨性别男性性工作者受访者是所有性行业受访者的26.4%。尽管大多数关于性工作和跨性别的讨论关注的时跨性别女性，研究显示很多跨性别男性参与到性行业中。”

影响性少数性工作者的社会、文化、政治和宗教障碍

社会、文化、政治和宗教的观念，加上教育、包容和意识的缺失，都导致性少数性工作者经历人权侵犯。坦桑尼亚性工作者反映，对他们安全的阻碍存于需要改变的习俗，需要针对警察和政治领袖进行倡导来改变政策。同样的，越南性少数性工作者说明，必须针对法律制定者、地方当局和医疗服务机构工作，来解决他们遭遇的歧视。要改变惩罚性法律、政策和措施，鼓励媒体减少对性少数和性工作者进行污名化描述。

传统宗教文化价值观在高度保守的肯尼亚发挥了加大作用。三个主要宗教（天主教、圣公会和伊斯兰）的领袖都谴责同性恋和跨性别身份代表着堕落、疾病和不道德。肯尼亚刑法认定同性行为是非法的。这让性少数者的生活更艰难；当地警方和当局关闭了性少数关于艾滋病预防和安全性行为的会议。对性少数性工作者而言，双重歧视的交叉让工作风险更高。

“作为性少数的一员，还参与性工作，这带来双重社会污名，导致一些性工作者自杀，或遭到来自朋友伴侣的暴力。”

性少数性工作者，肯尼亚

印度尼西亚受访者有近90%反映，受到过性少数社群的威胁，而印尼新起草的法律对同性行为刑事定罪。²⁸ 这导致性工作场所关闭，医疗外展项目不再为这些群体服务。Aceh省由民众实施伊斯兰沙利亚法，导致男女同性恋性工作者隐藏他们的性取向。跨性别女性被针对性打击，认为他们必然是性工作者。沙利亚法对广泛的性少数社群和性工作社群的影响迫使很多人逃离。

“印尼巴黎两个历史最久的地方被政府在2017年初关门了。曾在那里工作的人不再能得到任何艾滋病毒相关的服务和信息。”

性少数性工作者，印度尼西亚

社会、文化、政治和宗教的观念，加上教育、包容和意识的缺失，都导致性少数性工作者经历人权侵犯。

27 NCTE, 2015,《有效工作：跨性别者在性行业中的经历》，13

28 Kanupriya Kapoor,《大多数印度尼西亚人感到被性少数社群“威胁”：调查》，路透社，2018年1月25日

“科特迪瓦的污名指数研究显示艾滋病毒感染者中存在食品安全；我们了解男男性行为者和跨性别者中的艾滋病毒感染率是11%；这说明科特迪瓦性少数者和性工作更高的脆弱性。尤其是社会经济和宗教情况都不好的时候。我们形容为一个主体文化强烈影响性少数者日常生活的双重恐同父权社会，不容忍性少数。”

性少数性工作者，科特迪瓦

关于美国跨性别者权利和保护的政治情况：

“在纸面上，法律看着很好，但和实际执法是不同的。”现在跨性别者的能见度更高乐些，但仍有很多非裔跨性别女性死去。客人在被抓到谋杀跨性别女性时，仍在用“跨性别恐慌”辩护。特朗普执政使对被监禁的跨性别者的保护、医疗和基本服务可及性大步后退。对黑色人种和棕色人种进行区分，这使问题更严重（对有色人种性工作更危险）。”

跨性别有色人种女性性工作，美国

性少数身份在尼泊尔没有被刑事定罪，但国家报告显示像1970年的《公共罪行法令》等法律被误用来骚扰性少数者。²⁹ 尼泊尔签署并通过了国际公约来保护人权，还有多项国内法律政策是关于人权和艾滋病毒，但并没有在社区层面得到实现。

“2007年最高法院向尼泊尔政府直接发布命令，要求修改现存的歧视性法律，并形成适当的法制来保护性少数群体的权利。其中提到‘尽管没有特定法律声明同性关系是犯罪（这保留在对非自然性关系的定义中），但有反映国家机制隐性地助长了歧视。这来自于社会对这些人的负面态度。这一点不能忽视。”

性少数性工作者，尼泊尔

社群内的歧视

恐同和恐跨性别通常表现为家庭拒绝、难以找到职业和贫穷。因此，性少数社群经常从事性工作来谋生，以及逃离家人朋友的身体暴力。性少数性工作者面临来自社会的身体与心理暴力，但也面临来自性少数和性工作社群内部的污名和歧视。

性少数性工作者面临来自社会的身体与心理暴力，但也面临来自性少数和性工作社群内部的污名和歧视。

性少数性工作者反映被非性工作者的性少数社群所边缘化，因为他们对性工作有负面看法。他们也被其他性工作者边缘化和虐待。一些性少数社群中的团体有更多特权，如白人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

“历史上，跨性别和男同性恋社群彼此交恶。白人男同性恋一直参与塑造着对黑人跨性别女性的描述，导致所有里程碑式胜利都对白人男性同性恋有利，而不是有色人种的跨性别女性。”

有色人种跨性别女性性工作，美国

女同性恋性工作发现性工作让其他人认为他们是异性恋，损害了他们的自我身份、自我认知和自我决策。

“我和男人上床，这就抹杀了我爱女性不爱男人的经验。”

-女同性恋性工作，澳大利亚

29 USAID, UNDP, UNICEF, 2014, 《在亚洲做性少数：尼泊尔国家报告》

一些跨性别性工作者反映受到顺性性工作者的歧视和虐待，认为他们是抢客户的，有时还勒索他们。

“在性工作集中的地区，有跨性别女性从事性工作，天生女性的人就向他们抽成。如果不让抽成，他们就组团伙来打人，有时打得很严重。”

跨性别性工作者，秘鲁

“我喜欢去顺性女性性工作者待的地方，尽管他们不欢迎我。顺性女性经常试图向我的客户暴露我的性别身份或性取向，以便抢生意。有时我得威胁他们（顺性女性），才能留下。”

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牙买加

跨性别男性性工作者的隐形使他们进一步被隔离，更难被纳入广泛的性少数社群，难以获得服务和支持。

“跨性别男性没有代表，因为他们在巴厘性少数社群中能见度很低，跨性别男性在印尼从事性工作的也不常见。”

性少数性工作者，印度尼西亚

性少数移徙性工作者

移徙性少数性工作者，包括有证件和没证件的，都经历了很多暴力、剥削和管治；他们在新国家害怕登记，不敢因暴力和剥削去报案。

奥地利性工作者现在工作是登记制，但没有劳工权利，更可能被剥削。80-90%的奥地利性工作者是移徙者³⁰，很多没有注册，也不知道能保护自己的法律。没人向警方报告骚扰，因为他们没有适当的移民身份，担心被遣返。

奥地利所有性少数性工作者焦点小组参与者都反映受到过一般公众的骚扰和言语攻击。没有人向警方或其他机构报告这些。焦点小组的人表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移民身份才不报案，无论是否有身份证明。而且他们都不会说德语。

排斥跨性别和歧视移民的法律在加拿大也很多，强化了针对跨性别女性和移徙性工作者的歧视：就业措施；他们从事性工作的比例过高；直面危险客户；医疗机构拒绝服务。³¹

在秘鲁，近几个月来自委内瑞拉的移民很多，导致地方和移徙性工作者（包括性少数性工作者）之间情势紧张：

“有很多移徙性工作者，很多来自委内瑞拉外国性工作者……政府逼迫他们离开他们的国家，就到了我们国家。他们的性服务要价很低，比秘鲁通常的低，竞争激烈。”

性少数性工作者，秘鲁

焦点小组的人表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移民身份才不报案，无论是否有身份证明。

30 TAMPEP, 2010, 《欧洲性工作：25个欧洲国家卖淫情况图绘》

31 世界尊跨性别VS恐跨性别，跨性别欧洲, 2017, 《暴力恶性循环：跨性别与性别多元者，移徙和性工作》，13-14

在性工作中存在性别与性取向之间的竞争，反过来也一样，非性少数性工作者常是重要的盟友。

盟友与安全

在性工作中存在性别与性取向之间的竞争，反过来也一样，非性少数性工作者常是重要的盟友。性少数组织和非性工作的性少数社群成员，也能保护性少数性工作者，帮他们获取安全。

在美国，所有参与者都提到了性工作者组织，非性工作者激进酷儿和跨性别者是安全港。一名加勒比裔跨性别女性表示：

“很容易比较，纽约很容易，我的家乡洪都拉斯和加勒比就非常难。我像个人一样，在美国找到了家、避难所、机会和支持者。”

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美国

坦桑尼亚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反映，他们最强的盟友和保护者是女同性恋。在加拿大，毒品使用者和性工作组织被认为是安全方面的最好盟友。

在印尼，性少数性工作者表示从主流性少数性工作者获得支持：

“从我自己干开始，我没有人保护我。但我有急事儿时通常去 Yayasan gaya dewata (一个巴厘性少数NGO)。”

性少数性工作者，印度尼西亚

可发展的潜在盟友

国际组织，国家政府，媒体，主流性少数和性工作者组织都可能为性少数性工作者提供更多支持。

2018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第11版《国际疾病分类》(ICD 11)。³² 该版从心理健康障碍分类中取消了跨性别，这是全球跨性别社群的历史性成就。性别身份的病态化助长了针对跨性别者的污名、骚扰、刑事定罪、歧视和虐待。世界卫生组织请各国政府采纳ICD 11，在国内实施跨性别医疗政策，提升医疗服务机构对跨性别者需求的意识。

“ICD-11将在2019年五月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发布以供各国采纳，并将于2022年1月1日生效。现在是提前发布让各国考虑如何使用新版，准备翻译和培训全国医疗工作人员。”

这为各国提供了一个机会来确保跨性别社群(包括跨性别性工作者)，能够增加机会促进平等，提升满足他们需求的性健康与艾滋病毒预防服务。跨性别社群，包括性工作者在内，必须被有效纳入，参与到各国跨性别健康政策的制定中。

没多久之前，性取向和不同性别身份在全球北方国家还被广泛刑事定罪。性少数和性工作者运动在长期为去罪化和承认人权而奋斗的过程中有很多共同点。过去，跨性别、有色人种女性性工作者站在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前线。但他们仍然被隔离在更广泛的性少数倡导社群之外。不幸的是，在国家层面，团结性少数和性工作者运动取得的进展很少。例如，澳大利亚参与者表示，性少数和性工作组织的合作基本没有，顶多是彼此“容忍”。

“我们需要性少数支持组织和性工作者有更好的协作交流。我们处不好。我们之间没有对立，但总体的性少数社群看不起我们性工作者。”

性少数性工作者，澳大利亚

32 WHO, 2018,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版国际疾病分类 (ICD 11)》

有明确的机会能增加性少数社群组织和性工作者主导组织之间的搭档协作来增进理解。需要联结两者来消除紧张，避免对性少数性工作者的进一步边缘化，与所需的支持隔离。

一旦政府指控一个团体，整个联盟都会团结起来支持，倡导他们的权利。这是值得推广的模式。

肯尼亚和博茨瓦纳都反映性少数和性工作者组织之间关系紧密，可以作为团结两个社群的榜样。关键人群与毒品使用者和其他少数团体形成联盟来保护彼此。一旦政府指控一个团体，整个联盟都会团结起来支持，倡导他们的权利。这是值得推广的模式。

“比如，很多性工作者喜欢和性少数者在不同项目合作，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肯尼亚男女同性恋联盟与性工作者运动及其他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紧密合作。这种合作让运动和组织成长……彼此互动越来越好。”

性少数性工作者，肯尼亚

“博茨瓦纳性少数和性工作者组织成立了关键人群联合会，让组织领袖聚在一起讨论有效的合作，交流工作、挑战、成功和最佳实践的经验。关键人群联合会下设青年关键人群智库，由为组织工作的青年性少数和性工作者组成。联合会分享年度活动计划；强调他们需要其他组织协助的部分。这种赋权策略是持续的，我们用同伴方式来培训一个性少数和性工作小组，支持他们为社群其他人提供培训。我们在全国各地都有性少数和性工作者主导的支持小组，这些都由联合会支持。”

性少数性工作者，博茨瓦纳

越南性工作者主导组织支持性工作者学习艾滋病毒预防和面对警方骚扰时维权的知识。这带来了不同领域间更好的合作，也激发了一个新的性少数社群组织在越南的发展。

“在越南，性工作仍然是非法的……我以前不知道艾滋病毒预防知识，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很幸运，我遇到NVSW（性工作者主导组织），这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多亏我学到的，我和其他男性性工作者和男男性行为者成立了一个男男性行为者社群组织，叫做ALO BOY，旨在帮助更多是性工作者、跨性别和男男性行为者的社群成员。”

男性同性恋性工作者，越南

建议

以下是基于本简报中的证据和发现所提建议，对象是国家政府、政策制定者、宗教文化领袖、捐赠者以及性少数和性工作组织。这些建议针对处于性工作和性少数交叉领域者所经历的双重污名和歧视。

- 政府、政策制定者和倡导者必须积极寻求性工作、同性行为和多元性别身份的全面去罪化。刑事定罪是性少数性工作者在寻求医疗服务时所经历污名和歧视的主要动因，还会增加暴力。这是他们一直受到艾滋病毒过度影响的主要原因。
- 国家必须确保政策法律执行人员应当对针对性少数性工作者的暴力虐待行为负责，改进法律程序机制和司法可及性。
- 国家必须调查和起诉所有法律范围内针对性少数性工作者的暴力案件。政府也应当投入到针对暴力的预防项目，在设计项目时有效纳入性工作者和性少数社群。
- 政府和项目人员应当投入于执法人员、宗教文化领袖、医疗服务机构和其他关键服务机构的意识提升和培训，以减少性少数性工作者在寻求服务和公正时的阻碍，减少社会污名。
- 全面性健康与权利和艾滋病毒预防服务必须是包容性的，可满足性少数性工作者需求。各国政府应当采纳ICD-11，实施跨性别健康政策，提升医疗服务机构对跨性别者特殊需求的意识。
- 捐赠者需要考虑优先资助性少数和性工作主导组织开展研究，了解性工作性别身份和性取向，以改进干预服务的设计。
- 捐赠者应当资助性少数和性工作主导组织之间的多领域合作，来改善协作巩固联盟，尤其是在国家和地方层面。
- 性工作主导和性少数组织应当积极寻求机会合作，以确保他们能够更好地满足性少数性工作者的需求。

结论

本简报对性少数性工作者的经历以及恐同和恐跨性别对他们生活工作的影响仅是管中窥豹。必须采取措施来保护性少数性工作者，避免多重刑事定罪和持续地边缘化、暴力、污名与歧视，减少他们获取健康、司法和其他服务时的障碍。重要的时开展法律改革和生活变革，以保护性少数性工作者的基本人权。

重要的时开展法律改革和生活变革，以保护性少数性工作者的基本人权。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致力于保障性工作者和性工作领导机构的底层声音能够被听到。简报记录了性工作者在地方、国家和区域层面所面临的问题，这些简报也会试图分析全球趋势。

NSWP秘书处负责简报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并向成员征询意见。为了完成这些工作，NSWP会雇佣：

- 全球顾问来开展文献研究和面向NSWP成员机构的全球网络意见征询，协调和收集来自国别顾问的意见，分析各地区的差别，并起草全球简报。
- 国别顾问将收集信息和记录国家个案。

“性工作”一词反映了性工作者社群内部巨大的多样性，包括但不限于：女性、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双性恋性工作者；异性恋男性性工作者；感染艾滋病和其他疾病的性工作；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年轻的成年性工作者（年龄在18-29岁之间）；有证件和没有证件的流动性工作者，以及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生活在城市和农村地区性工作者；残障性工作者；以及被拘留或监禁的性工作。



The Matrix, 62 Newhaven Road
Edinburgh, Scotland, UK, EH6 5QB
+44 131 553 2555
secretariat@nswp.org
www.nswp.org/zh-hans

1111 Broadway, Floor 3
Oakland, CA, 94607, USA
+1 510 849 6311
contact@mpactglobal.org
www.mpactglobal.org

NSWP是一个私营非营利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编号：SC349355

项目支持：



MPact以及NSWP是“弥合差距——重点人群的健康和权利”的联盟伙伴。这个独特的项目致力于解决性工作者、毒品使用者和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人士所面临的人权侵害，以及获得艾滋病和健康服务的情况。请登陆 www.hivgaps.org 了解更多信息。